

二零零九年·第六辑

SHUPIN

书品

- ◎辛德勇 关于《水经注图》
- ◎来新夏 文如其人
- ◎黄进兴 新版《哈佛琐记》序
- ◎李 军 三十家 三十年

中 华 书 局

序跋录

- 辛德勇 关于《水经注图》 3
- 来新夏 文如其人
——为《籍海零拾》序 7

- 黄进兴 新版《哈佛琐记》序 9

学林往事

- 冯春龙 漫谈解放前中华书局主办的几份杂志 11
- 散 木 从吴宓的日记看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沧海遗珠 16

专题书评

- 熊国祯 肩负着时代文化使命的重要工程
——祝贺中华书局《新集注工集》《山文》 19

评书论学

- 李 军 三十家 三十年
——读《近代藏书三十家》(增订本) 23
- 陈 虎 解读 3~6 世纪“痛并快乐着”的中国北方社会
——评《3~6 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
群体研究》 30
- 聂鸿音 《俄藏黑水城所出〈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〉整理与
研究》读后 35
- 王晓欣 郑天挺教授的元史教学与思考 40
- 陈友康 彰显清代文学的特色、价值和地位
——评《清代文学论稿》 48

马延炜 历史深处的探索

——评《阮元,1764~1849:鸦片战争前19世纪

中国一位主要学者兼官员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涯》 54

罗 瑛 目录是学术史的缩影

——读《目录学与学术史》 61

吕红光 评姜亮夫论文精选集《国学丛考》 69

编撰撷谈

袁津琥 《艺概注稿》琐谈 73

读书札记

国 威 《〈比丘尼传〉校注》补正 78

严晓星 《我对东皋禅师琴歌之浅见》补正 81

彭向前 释“兀擦” 83

商榷篇

徐志卿 “西园秘器”质疑

——《旧唐书·李林甫传》疑误一则 85

李伟燕 《日本考·倭国事略》江浙地名正误 90

书苑撷英

义净著 王邦维校注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》、《南海寄归
内法传校注》 戚其章著《甲午战争新讲》 洛地著《词体构成》

主办单位:中华书局 主编:黄 松 副主编:冯宝志

编辑:《书品》编辑部 责任编辑:梁 彦

邮编:100073 地址: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

电话:(010)63458236 传真:(010)63458226

印刷:北京未来科技研究所印刷厂 订购处:全国各地邮局

国外代号:1369BM 国外发行: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(北京399信箱)

国内代号:18—206 国内发行:河北省廊坊市邮政局

网址:www.zhbc.com.cn 电子信箱:shupin@zhbc.com.cn

关于《水经注图》

● 辛德勇

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一书，撰写于北魏时期，以河流水道为脉络，记述古往今来各项地理要素，是研究北魏以前地理问题的重要文献，将书中的文字记述转绘成地图，无疑会给读者提供很大便利。

根据现有文献记载，最早致力于这项研究的人，应属清代初年的江苏常熟学者黄仪（字子鸿）。黄仪究心舆地沿革，曾与顾祖禹、阎若璩、胡渭等人一道进入《大清一统志》局，“尝谓班固《地志》所载诸川，第言其所出所入，而中间经历之地不可得而闻，惟《水经注》备著之，乃即经所著之水，每水各为一图。如某水出某县向某方流，径某县某方，至某县合某水、某县入某水，无一不具。阎若璩见之，叹曰：‘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。’”（钱林《文献征存录》卷三《顾祖禹传》附《黄仪传》）乾隆年间研究《水经注》成就卓著的学者赵一清，曾描述此图状况说：“黄子鸿依酈《注》每水各写一图，两岸翼带诸小水，精细绝伦，参伍错综，各得其理。”（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卷首《水经注参校诸本》）遗憾的是这部地图没有能够流传下来。不过黄仪《水经注图》的质量估计不会很高。这是因为《水经注》一书传世版本，存在着包括经注混淆在内的诸多严重舛误，若非先行加以系统整理，便骤然绘制地图，会遇到大量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
及至乾隆年间，经过全祖望、赵一清、戴震诸人的校勘整理，《水经注》始大致恢复原貌，从而才能比较准确地绘制书中各项地理要素。

在这一学术背景下,江苏阳湖人董祐诚(字方立),于嘉庆二十年前后,“节取《水经注》,证以今水道,分图系说,自成一书。为之累年,仅得四卷。卷中图、说俱备,惟河水自采桑津以下,有图而无说。图大者径数尺,小者亦径尺许”。不幸的是董祐诚著此《图说》未及终卷,竟于道光三年英年早逝。道光十年,祐诚兄基诚,褒集汇刻其著述为《董方立遗书》。令人遗憾的是,大概是由于《水经注图》图幅过于阔大,刊刻困难,基诚准备将来“别为一册”,另行刊印,仅仅是以“水经注图说残稿”为名,在《遗书》中刊入其文字疏释内容(董祐诚《水经注图说残稿》卷首董基诚序)。结果图稿部分却始终没有刊行,以至失传。流传下来的《水经注图说残稿》,侧重引证相关史籍笺释地理沿革,并多注解今地所在,这正是编绘《水经注图》的前期工作。

在董祐诚之后,江苏江宁人汪士铎,大致在道光年间,又勾稽群籍,编绘出一部内容比较详细的《水经注图》。汪士铎对《水经注》研究,倾注很多心血,撰著有《水经注释文》一书(朱记荣《国朝未刊遗书志略》),正与此图相辅相成。令人惋惜的是,这部《水经注图》毁弃于道咸之际的兵燹之中,同样没有能够流传下来。咸丰五年,在安徽绩溪山中躲避战乱的时候,汪氏于授徒之暇,复又“补为《水经注图》二卷”(汪士铎《水经注图》卷首胡林翼序)。但汪士铎补绘此图,仅仅是为疏释班固的《汉书·地理志》而作,内容远不如旧图详备。汪氏自言当时“所居深谷,考证无书,舛误之处,良多不免”(汪士铎《水经注图》卷末汪氏自撰跋语),可见他本人对图上内容的考订并不满意。加之僻处深山,看不到详细的底图,图上标绘的水道也很不准确,颇似随手画出的示意性草图。咸丰九年,汪士铎应邀到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府供职,胡氏乃于咸丰十年出资刊印此图,同时还附印有汪氏所撰《汉志释地略》和《汉志志疑》这两种短篇著述。惟勘定印制成书,是在两年之后的同治元年,卷末附有汪士铎在这一年所作覆校校记。

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期间,湖北宜都人杨守敬,在其弟子

熊会贞的襄助下,重又编绘出一部篇幅宏大的《水经注图》。杨、熊师弟二人,以清代中期全祖望、赵一清、戴震等名家的精湛考证成果为基础,潜心多年,进一步深入研究,写就《水经注疏》一书,成为清人研究此书的集大成著述。杨守敬在序言中叙述说,他编绘这部图集,乃是鉴于汪士铎旧图“参稽未周,沿溯不审,往往与鄙书违异”,因而“既同熊君会贞撰《水经注疏》,复为此图以经纬之”,即与所撰《水经注疏》相并而行,互为表里。杨氏此图最初刊印于光绪三十一年,采用胡林翼刊印的《皇朝中外一统舆图》亦即所谓《大清一统舆图》作为底图,用朱墨两色分别套印今古地名,不仅内容空前详备精准,形式也最为得体,允称一代颠峰之作。

虽然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的编制水平,总体上远远超出于董祐诚和汪士铎书之上,但并不能完全取代后者,董、汪两人的著述,仍有独到之处;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地图编绘史的研究来说,价值愈为重要。这三种书籍的旧刻本,现在查找都很不方便。近年虽有出版社印行过其中某些图册,但或者是收录在部头较大的丛书当中,不便备置案头检读,或者选择底本存在严重缺陷,学者利用,仍然存在一定困难。

有鉴于此,现将董祐诚《水经注图说残稿》同汪士铎、杨守敬分别编绘的两部《水经注图》合编在一起,影印出版。《董方立遗书》的道光原刻本,书版损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,印本流传稀少,故董祐诚《水经注图说残稿》这次采用祐诚子貽清同治八年成都重刻本作为底本。汪士铎《水经注》图,采用咸丰同治间原刻本。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,仅有光绪三十一年杨氏观海堂原刻本一种版本,这次即据以影印。

需要说明的是,汪士铎绘《水经注图》,刘锦藻《清朝续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、平步青《霞外捃屑》卷一“国史儒林传目”条,以及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等书均著录为两卷,但现在见到的刊本,所有地图都是统合在一起,没有再划分卷次,即均属一卷本。此书卷首丁取忠序云:“此本丛杂,君目眊不复能综理。……余分为图及附录

为二卷，督长沙张伟夫刊之。”因知所谓“二卷”者乃连同附录一卷计之，汪氏此图从未分作两卷，孙殿起《贩书偶记》著录此书，作“《水经注图》一卷、《附录》一卷”，洵属允当。刘锦藻《清朝续文献通考》与平步青《霞外捃屑》，于所谓“《水经注图》二卷”之外，尚同时著录“附《汉志释地略》、《汉志志疑》各一卷”，差误更多。另外，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刻成之后，书版陆续做有很多剗改，杨氏随改随印，故前后不同时期的印本，内容会有一定出入，读者在深入研究某些问题时，需要留意这一情况。

《水经注图(外二种)》，杨守敬等编绘，中华书局2009年9月，460元)

· 更 正 ·

《书品》2009年第五辑刊熊国祯先生《〈智慧澄明愿力宏——深切怀念任继愈先生〉》一文中，第7页第9行应为“是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婿”；刊吴小如先生《〈汉语成语考释词典〉（修订本）序》一文中，第14页第9行应为“人若不自知”，倒数第2行应为“今人但见有‘差’字”。特此更正。谨向广大读者及作者致歉。

《书品》编辑部

文如其人

——为《籍海零拾》序

● 来新夏

《籍海零拾》的作者曾贻芬、崔文印伉俪和我是数十年的挚友。我读过他们的文章和著述，并为他俩合著的《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》写过评论。文印也评点过拙作多种，所写书评，实事求是，言之有物，令我深思。尤其见交情者，有两件事使我非常感动：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的第一本堪称学术著作的《古典目录学浅说》出版后，文印主动为之写了较长的书评，在当时著名杂志上发表，有较大反响，把我的书推进学术圈子，让我步上学术通衢。二是二十年前，我曾和文印谈过我手头的存稿《书目答问汇补》，准备增补成书。文印当即鼓励我着手，并表示即使退休，也要把这件事做完。其间文印在我全然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毅然向书局领导推荐《书目答问汇补》一稿，事后获悉，深感厚德。时过不久，《书目答问汇补》在韦力、李国庆二君协助下，终于完稿，由中华书局出版，而文印君实任其责，不遗细小，详加编订，终为学林增一读书工具，二十余年宿愿得偿，岂非天意！而崔君伉俪数十年徜徉于学海，相濡以沫，朝夕共研，时有新作载诸报刊，我读其泰半，今汇集其文，成《籍海零拾》一书，复垂爱于我，命作序言。书缘、友情，义不可却，乃以文品、人品立论，而为之序云。

《籍海零拾》以书为中心，为崔氏伉俪读书、论书、评书之作，分考辨、通论、书评、序跋四编。共收文82篇，附录4篇。内容丰富充实，考订有理有据，文字朴实清顺，为后学所易接受。而我读其文，若隐隐中有作者品德之影像在移动，示我以人与文一体之理。

文人著述，志不掠美，往昔或多有之，而今则抄袭掠取之风日

炽,犹恬然不以为耻,而能尊重他人成果者几稀。文印胸怀坦荡,不没师友之功,其《考辨编》中所论李贽诸作,念念不忘师友之帮助与指导,而于李贽《史纲评要》之研究,不仅追思王重民先生之蒙冤,更以崇敬之心,反复陈述王重民先生对其研究指导之功。实为今世难得之文品。信哉!斯人也而有斯文。

《通论编》中,多贻芬有关《通典》研究之作,兼及郑氏《通志》、马氏《通考》,即世所谓三通之学。三通之书,昔贤重之,尝谓不读三通序,是为不通,是不明三通之学,亦难称通儒。贻芬读硕士时,即着意三通,可谓得学术之窍要矣。而今一读《前言》,作者又归功于其导师白寿彝先生。不忘师承,今已难求。另据文印相告,贻芬之立志钻研《通典》源于考研时未能应对有关《通典》之质询,引以为耻,遂发奋潜研,终成名家。今之学子遇此,不过一笑而已,《中庸》有云:“知耻近乎勇”,贻芬之有此大勇者气魄,虽须眉亦当自愧。

学问有显晦之分。显学趋之者若鹜,晦学则频道冷落少人问津。治晦学者非敝屣荣华,恬淡自若者难为之。《金史》为二十四史中少有涉足者,乾嘉史学优长,而治《金史》有著作者,亦不过施国祁、钱大昕、倪灿诸家所著而已,读时贤著作,亦较少获见,而于《籍海零拾》中,有关《金史》者有多篇,如《〈大金国志〉初探》、《〈大金国志〉新证》、《〈金志〉与〈大金国志〉》、《金代在史学上的成就》、《金史散论》、《金史评介》及《金史人名杂考》等皆对治金史者有所裨助。至若《书评编》所收诸文,亦多实事求是,于受评者多持宽容,于读者可作导读,亦足见作者仁人之心。

我受作者伉俪所属,既读其文,复知其人,则其书固非一般著述,而系作者伉俪文品、人品一体之结晶,欣喜之余,激情喷薄而出,乃捉笔以记所得。设作者伉俪再有新著,望九一叟,当更操笔受命。是为之序。

2009年10月16日写于南开大学蘧谷,行年八十七岁

新版《哈佛琐记》*序

●黄进兴

在旅途中,读到《纽约时报》(2008年8月5日)报导俄国作家索忍尼辛(Solzhenitsyn)辞世的消息,心中甚觉怅然。当年他在哈佛毕业典礼上,振聋发聩、大气磅礴的讲演,至今记忆犹为深刻。

苏联解体,此公返归祖国,但所持文化保守的论调,与时局格格不入,遂过着隐士般的生活,逐渐为人们所淡忘。记者尚言到,新世代的年轻人甚至只知其名,而未知其人,奚论拜读他的大作。

三十年前,怀着前往“西方取经”的宏愿,远渡重洋,到哈佛进修。其时名师云集,诸如哲学的劳尔思(John Rawls)、心理学的寇博(Lawrence Kohlberg)、社会学的贝尔(Daniel Bell)、思想史的史华慈(Benjamin Schwartz),百家齐鸣,交织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曲。身临其境,聆听人间知识的曲目,何其幸运。

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,大师逐一殒落,哈佛也迈入一个“无大师的时代”。但这种自由、多元、独立的学术精神,却深植我心,且影响了日后自己治学的取向,而受用无穷。抚今追昔,感激万千。

《哈佛琐记》受到海峡两岸读者的喜爱,委实出人意表。究其实,拙作不过个人留学期间琐细的回忆,却能引起无数人的共鸣,哈佛何其有幸。倘谓其为“心灵”的故乡,似不为过。然而,诚如詹姆士(William James)所言,哈佛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。因此,真正的哈佛人无需魂牵梦挂,而是勇往直前,开疆辟土,追寻美丽的新世界。年事既长,犹以此自勉,但愿不致贻

笑大方。

又,好友翟志成兄撰有《这样的吴咏慧》一文,刊于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,生花妙笔,趣味盎然;得其允诺,增录于后。之前,赖英照学长亦曾撰文,补充拙作之不足。藉此“新版”之际,得以向两位再表谢意。他们的鸿文增辉拙作许多。

中华书局部分台湾学者著作

《庄子今注今译》	陈鼓应注译	76 元
《老子注译及评介》	陈鼓应注译	22 元
《寻羌——羌乡田野杂记》	王明珂著	30 元
《羌在汉藏之间》	王明珂著	48 元
《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》	王明珂著	39 元
《坐火车游盛唐》	赖瑞和撰文 摄影	30 元
《内北国而外中国》	萧启庆著	128 元

漫谈解放前中华书局 主办的几份杂志

●冯春龙

1912年创办的中华书局,是我国解放前与商务印书馆齐名的著名出版机构。它以出版顺应共和形势的中小学教科书起家,在民国初年的文化出版界率先掀起了一场教科书革命,并迅速占领图书市场,站稳脚跟,成为出版重镇。在1912~1949年间,中华书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,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教科书、工具书及各类学术图书,整理、影印了《四部备要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等许多传统文化古籍,创办了一批经营实体,主办了一大批期刊杂志,为传播文化、普及教育、启迪民智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本文主要介绍中华书局主办的几份重要刊物。

中华书局的掌门人陆费逵(1886~1941)先生,是一位颇具远见和胆识的爱国出版家、教育家,他早年任职文明书局、商务印书馆,1909年受命出任商务印书馆创办的《教育杂志》(月刊)主编。《教育杂志》(月刊)是我国现代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,以“研究教育、改良学务”为宗旨,广泛介绍国外教育思潮和教育制度,探讨国内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,成为民国成立前后很有影响的杂志。中华书局成立后,陆费逵在积极组织、编辑出版《中华教科书》的同时,也非常重视杂志的筹划和出版。他认为:“杂志是文明国必需品”,“一国学术之盛衰,国民程度之高下,论者恒于其国杂志发达与否视之”,“杂志多则学术进步,国民程度亦高;而学术愈进步,国民程度愈高,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。”中华书局成立不久,他就着手创办了《中华教育界》(月刊)。随后,在1914年初至1915年初,

又约请专家先后创办了《大中华》、《中华小说界》、《中华实业界》、《中华妇女界》、《中华童子界》、《中华儿童画报》和《中华学生界》等杂志,号称“八大杂志”。此外,还出版中国留美学生会会刊《留美学生季报》。这些杂志在中华书局的早期发展史和我国近代出版史上,可谓盛极一时,蔚为大观。可惜,由于书局经营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,1916年6月,《中华学生界》、《中华妇女界》、《中华实业界》、《中华小说界》等相继停刊;同年底,由梁启超担当主编的《大中华》也宣告停刊。

“民六危机”后,随着书局状况的日益好转,陆费逵又组织创办了《中华英文周报》、《小朋友》周刊、《小朋友画报》、《中华图书月刊》等刊物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创办了综合性杂志《新中华》(半月刊)。此外,还出版发行了《少年中国》(月刊)、《学衡》(月刊)、《解放与改造》(月刊,1920年第3卷起改名为《改造》)、《诗》(月刊)。

在陆费逵领导中华书局主办的众多杂志中,以《中华教育界》(月刊)、《大中华》(月刊)、《新中华》(半月刊)、《小朋友》(周刊)最为著名。

《中华教育界》(月刊)创刊于1912年1月,是中华书局创办的第一份杂志,也是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之一。该杂志先后由顾树森、沈朵山、余家菊、陈启天、左舜生、倪文宙等主持。创刊之初,本着“研究教育,促进文化”的宗旨,设有教育评论、教育论著、中小学研究、国外教育译述、国内外教育新闻等栏目。主要撰稿人有范源濂、黄炎培、黎锦熙、周建人等。陆费逵不仅热情支持刊物,而且还经常为该刊撰写文章,发表了《新学制之要求》、《论人才教育、职业教育与国民教育并重》、《新学制之批评》、《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》、《学界风潮感言》等一系列论著。《中华教育界》(月刊)所刊文章紧紧围绕当时教育制度改革,结合国内教育实际,大力介绍西方教育思想、教育内容、教育政策、教育设施和教育方法,内容生动活泼,每期还附有彩色插页,图文并茂,深受教育界好评,

成为当时与商务《教育杂志》并列的两大教育专业刊物。1937年,抗日战争爆发,特别是日本对上海发动了“八·一三”事变,上海书业处境骤变,《中华教育界》出至第25卷第8期而被迫停刊。抗战胜利后,1947年1月,中华书局决定复刊《中华教育界》(月刊),并由姚绍华主持复刊工作。复刊后的《中华教育界》(月刊)另起卷期。新中国成立后,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事业的调整,《中华教育界》(月刊)出至1950年12月新4卷第12期停刊。作为解放前重要的教育类专业杂志,《中华教育界》(月刊)曾经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《大中华》(月刊)创刊于1915年1月,陆费逵诚邀梁启超担任主编。陆费逵认为清末民初国内杂志兴起,但“持久者殆无一焉。固有风气未开,阅者不多,然组织之基础不完固,实为一大原因。盖此种事业,非有适当之人才与目的,适当之资本与机构,固不能久大而有裨于社会也。……杂志事业,我局已认为要图,自当竭尽心力为之,资本、机构二者,固不俟言矣”。聘请梁启超主持撰述,“此外担任著译诸君,亦皆学术专家,文章泰斗”。他在《宣言书》中阐述了《大中华》杂志的目的主要有三方面:即“一曰养成世界智识,二曰增进国民人格,三曰研究事理真相,以为朝野上下之南针。欲达第一项目的,故多论述各国大势,介绍最新之学术;欲达第二项目的,故多叙述个人修养之方法及关于道德之学说;欲达第三项目的,故研究国家政策与社会事业之方针,不拘乎成见,不限于一家之言,一以研究为宗,即有抵触冲突之言论,亦并存之”。梁启超作为主编,在《大中华》题为《中国之前途、国民之自觉心、本报之天职》的发刊词中写到:“本报同人不敢,窃愿尽其力所能逮,日有所贡献,以赞助我国民从事个人事业、社会事业者于万一,此则本报发行之职志也。”《大中华》前后存在时间虽不长,但当时的影响很大。它是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杂志,设有政论、专论、文苑、法令、时事日记等栏目,经常针对时政,大胆进行评析。其中梁启超的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、欧阳中涛的《过去一年之感想》、蓝公武的《辟

近日复古之谬》等文章，深刻揭露袁世凯的帝制阴谋，猛烈抨击专制独裁和社会的腐败黑暗，深受读者的好评。当时的文化名人范源濂、王宠惠、张君勱、张謇、林纾、王闿运、张相等都曾在《大中华》发表文章，抒发对时政的看法。可惜，由于中华书局的经营出现波折，1916年12月，《大中华》发行至第2卷第24期而停刊。

《新中华》(半月刊)是陆费逵在20世纪30年代初主持创办的另一份刊物。它是在日本对华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、中日矛盾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诞生的。当时，日本已吞并我东北三省，并对上海发动了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全面侵华战争已不可避免，陆费逵有感于人们“得过且过，假忍辱负重美名，过醉生梦死的生活”、“有些人忘记了中国，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”的现状，内心忧虑不已。为了唤醒民众，1932年底，他邀请周宪文协助创办一份半月刊，起初决定以“中国和中国人”为刊物的名称，其用意就是：“第一，要人人有国家的观念；第二，要人人明白自己是中国人。”后来在周宪文的建议下，陆费逵决定用《新中华》作为半月刊的刊名。1933年1月，《新中华》(半月刊)正式问世，陆费逵在创刊号上发表了《备战》一文。他在文中冷静分析了国际形势，指出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，大声呼吁集中全国财力人力，停办一切不急之务，“快快备战”，并且就军事、民食、交通以及文化等各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。不久，他又在《新中华》发表了《东三省热河早为我国领土考》一文，严词指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。《新中华》(半月刊)是一份综合性刊物，最初由周宪文、钱歌川、倪文宙主持，设有论著、文艺、谈薮、新刊介绍、讽刺漫画、时论摘粹、半月要闻、通讯等栏目，陈望道、章伯钧、王亚南、胡乔木、巴金、郁达夫、钱俊瑞、薛暮桥、千家驹等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。1937年8月，当杂志出版至第5卷第15期时，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停刊。1943年在重庆复刊，改为半月刊。抗战胜利后，迁至上海，复改为月刊。1951年停刊。

《小朋友》(周刊)是陆费逵领导中华书局创办的又一颇具影响，且跨度时间最长的刊物。1922年初，商务印书馆创办了《儿童

世界》杂志,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。这时,中华书局已经从“民六危机”的困境中摆脱出来,同年4月,在陆费逵的支持下,中华书局由黎锦晖、王人路、陆衣言、黎明等人策划的《小朋友》(周刊)问世,并由黎锦晖担任首任主编(1926年由吴翰云接任)。该刊设有故事、童话、笑话、儿童小说、诗歌、剧本、科学游戏、谜语等栏目,每逢周四创办,小32开,每一季度为一卷(13期)。刊物始终贯彻“陶冶儿童性情,增进儿童智慧”的办刊宗旨,内容丰富多彩,形式生动活泼,图文并茂,印刷精美。每期的刊头“小朋友”三字,都由小朋友自己书写,每期一人,并在目录中刊出该小朋友的姓名、所在学校和班级;每期封底刊登“爱读《小朋友》的相片”;另外,还经常刊登少年儿童创作的作品。因此,杂志一经问世,立即吸引了大量小读者,也深受广大家长的欢迎,正如陈伯吹先生所说,是“风行天下”。创刊号曾创下了20万份的销售业绩。该刊还非常注重对少年读者的爱国主义教育,曾出版过如“提倡国货”专号和“抗日救国”特刊等;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后,还编辑《淞沪抗日战争记略》,作为附刊发行。陆费逵作为中华书局的一把手,非常关心《小朋友》杂志的成长,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之余,还经常抽出时间,在该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,鼓励小朋友们树立理想,不断进步。1937年10月,因中日战争爆发,《小朋友》(周刊)出至第777、778两期合刊后被迫停刊。1945年1月,设在重庆的中华书局决定复刊《小朋友》杂志,由周刊改为半月刊,陈伯吹担任主编。复刊后的《小朋友》与战前的杂志卷期相接,先后共出了18期。1946年1月,《小朋友》杂志随中华书局迁回上海,恢复周刊,仍由陈伯吹主编。1950年12月,出满1000期后,《小朋友》(周刊)改为彩色胶印,主要以低幼儿童为读者对象。1002期改为月刊。1952年12月出至1048期后,随着国家对出版业的调整,由中华书局创办、发行的《小朋友》杂志改由新成立的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。新

(下转第34页)

从吴宓的一则日记看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沧海遗珠

● 散 木

《吴宓日记》1942年4月18日记曰：“阅报，见教部给学术奖、文艺奖名单。如冯友兰之《新理学》得一等奖。邵祖平之《培风楼诗续存》，卢前之《中兴鼓吹》，以及陈铨之《野玫瑰》等，均各得奖。而吾之知友中，如柳公之《中国文化史》，彤之《佛教史》，极之《哲学新论》、《道德哲学》，碧柳之《白屋诗集》，王越之《南北集》等，则不闻称道。宓深为感愤，且痛伤。”

吴宓所感伤的其“知友”的著作，如柳诒徵《中国文化史》、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，后辈如吾侪还多少知道一点，吴芳吉（字碧柳）的《白屋诗集》就陌生了一些，景昌极、王越，更加陌生了，更毋庸说他们的著作了。这也难怪，半个多花甲过去，就是当年教育部颁发的所谓学术和文艺诸奖，冯友兰“大名垂宇宙”，人们还晓得；这邵祖平、卢前、陈铨三人，恐怕就不是非专业的人士所能识知的，吴宓先生如再世，想必又要“痛伤”不已了。

吴宓的日记难免有讹记之处，如汤先生的著作当年是获得了奖的，似乎汤一介先生曾忆及其父对之不屑的情节，但文章是一时找不到了。由此想到自从写作和编纂学术史和文学史成为“热门”以后，堪称网罗不遗的闲著，似乎还未能见到。闲富若杨义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囊括作家600余人、作品2000余种，甚是浩瀚之作，然而沧海遗珠，若吴宓先生甚赞过的潘伯鹰、胡彦久小说《人海微澜》、《穷巷斜阳》等等，恐怕就难能进入其视野了。当然，以书海之汪洋、各家评判作品之标准不一，入选学术或文学史的文本自